



小
书



中国文学
欣赏举隅

傅庚生 著

北京
出版社

大 家 写 给 大 家 看 的 书



小
书

中国文学
欣赏举隅

傅庚生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傅庚生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3. 1

(大家小书)

ISBN 7-200-04715-5

I. 中… II. 傅… III. 古典文学-文学欣赏-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551 号

·大家小书·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ZHONGGUO WENXUE XINSHANG JUYU

傅庚生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8.75印张 138 000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200-04715-5

I·746 定价: 14.00元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



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善于以古诗人之心为心的学者

——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新序

文怀沙

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陆机）

新版傅庚生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即将面世，想起“好书”比著好书的“好人”的寿命要长得多，我既高兴又复怅惘。

故友傅庚生先生辞世已经整整十八个年头了。今年四月间，他患难相共的夫人——仇荣华女士终于脱离了长期的病痛和困苦仙逝了。请允许我在本文开篇处，首先向这位“不矜不伐”的夫人致敬。因为正是这位知识妇女以她的终身辛劳和“默默无闻”为代价，为丈夫排忧解难，成就了丈夫的不朽之盛业。傅庚生、仇荣华贤伉俪，在我心上是一对闪光的名字。

成书于六十年前的、傅庚生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有着怎么样的生命力？经过历史的筛选，至少可以被公认，这是一部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方面的名著。该书写成于 1943 年，经



余冠英先生推荐，由叶圣陶先生主持编入《开明青年丛书》，同年出版，遂成为颇受广大读者喜爱的著作，至1949年前，再版印至九版，此后，虽然本书在大陆绝版，但在香港、台湾等地出版了大量的翻印本。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简体字本，大体照原样印出，改正了个别的错别字，但对原著也作了个别不必要的改动。1985年中国书店、1989年上海书店又分别出版了此书的翻印本。原“开明本”的讹误，未经修改，一仍其旧。写到这里，我心中很难受，忝为新中国解放后第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的主编，我虽然帮助过许多好朋友出书，他们之中有：游国恩、俞平伯、孙楷第、余冠英、林庚、李长之、王古鲁、沈祖棻、程千帆、苏渊雷诸先生，还有当时被认作新生力量，后来成为学术权威的：王瑶、王运熙、周汝昌、王泗原、王拾遗诸先生；但那时我念念不忘、一直企图收入到我主编的丛书之中的至少还有下列三种书：

- 一、《人间词话详注》 王国维著 俞平伯校注
- 二、《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傅庚生著
- 三、《谈艺录》 钱锺书著

钱锺书先生很谨慎，他多年以来都很关心我，他指出这些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连他写的小说《围城》也不主张重印。作为文人，他有矜持的一面（区别于庚生先生的“不矜不伐”）；也有积习难改的一面，当

他情难自己时，也曾向我出示他密密麻麻的《管锥编》的片段稿本，他说这是聊以自娱，不足为外人道也。后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惹出大事，我被公开点名批判。钱对我维护备至，劝我要慎蓄锋芒……其实，我当时担任主编，是有权不使《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在大陆绝版长达三十五年之久的。我困于朋友的柔情厚爱，为当年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其实印了就印了，我缺乏“个人得失，了不足论”的精神，我对不起傅庚生先生，更对不起那些势必会成为傅先生此书受益者的忠实读者们。

现在咱们中国大陆的文化出版界焕然一新派生机。关于文学艺术的赏析专著，多到难以胜数。但经得起反复仔细品味的还是很有限的。因此，我愿意隆重地向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朋友推荐上述三部书。这三部书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出诸青、壮年学者之手的不朽之作。

《人间词话》是一本出现在 20 世纪初的薄薄的小册子，字数仅五千余字（以后加上“删稿”也不及两万字）。但“境界说”言简意赅，自足千古。王国维说的好：“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王国维的书不难读，他认为意与境的中介是真切自然的语言。这部书正是用真切自然的语言写成的，静安公其“识”也高；

《谈艺录》是《管锥编》的先驱之作，我们可以



领略著者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之学。他被视为 20 世纪的一代硕儒是毫不奇怪的。读钱先生书最令人受益的是：使人感到“学，然后知不足”。默存公其“学”也博。

我要求文学同好，特别是文学青年必须认真精读的便是这册《中国文学欣赏举隅》。这是一部有“学”又有“识”之作。我六十年前初读此书便欣然赏之，为之振奋不已，而今老夫耄矣，再读此书，如面对故人的娓娓清谈，仍欣然赏之，为之振奋不已。

请我的老朋友和不曾见面的年轻朋友们翻阅傅先生在本书中关于陶渊明与郑板桥其人与其文的比较，还有论袁枚祭祖母的诗篇。清代才士的猥恶嘴脸，落在傅公笔下，竟不打自招了。还有，特别有意味的如他谈李清照的《声声慢》和《醉花阴》等，都非常精彩。温良敦厚、善良老实的庚生先生说到底是个未失童贞——满蕴正义感的学问家。这样的品质应是他“学”与“识”的出发点。所以他的“学”与“识”理所当然能赢得真诚的读者们的敬爱。

读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不仅增长学问、见识，也能开拓我们的良知、良能。

《举隅》原序是陆侃如先生写的。陆先生在文中不仅批评也讥嘲了梁宗岱先生。陆、梁二公与我虽无深交，也还都是与我有一面之雅的朋友。

我想借此说几句公道话。

梁先生写的《屈原》我读过，生面别开，很有特色。但那是一本文学著作（区别于纯学术著作），梁先生以诗人的敏锐直扣屈原传世之作，丰盈的诗情充斥字里行间。他热爱屈原诗篇，也热爱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伟大诗人但丁。东、西方划时代的两位诗人，在梁公笔下进行“想当然耳”的类比。那书写得文采斐然，发人深思。梁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记得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有家出版社约他写学术性的屈原传记，他听从我的建议，由他向出版社推荐游国恩先生完成了这一任务。由梁公我想起了我国古代两位号称历史家的真正的文学家，一是左丘明，另一是司马迁。早就有人指出：“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左传》中确实有许多荒诞的记述，好比《圣经》，我宁愿以之作为文艺读物来欣赏。至于论“史笔”，班固应优于史迁；论“文笔”，则龙门应遥遥领先于班孟坚。所以讲考据，梁公远逊陆公。但陆公的考据也未必精确，例如他一口咬定《橘颂》是屈原早年未成熟的作品，所以“诗思窘狭，抽象话太多”。我认为这“考据”，是既未尝“考”，又缺乏“据”的。《橘颂》既是咏物诗，则自有其一定范围，无所谓“狭”，风格那样雍容而朴实，又无所谓“窘”。把这首咏物诗认作屈原晚年作品，也无不可，归绚烂于平淡是也。

作为我国新诗坛被鲁迅先生誉为卓越抒情诗人的冯君培（至）先生，50年代写了一本《杜甫传》。我



以极大的热情竟读了这本今诗人写古诗人的书。据我所知，君培先生的确花了大气力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但总使我觉得有些干巴巴的。诗人杜甫与诗人冯至的内心世界无灵犀可通。较之冯所著《伍子胥》有天壤之别。《伍子胥》连昭关故事都不曾涉及，但伍子胥这个人物被写活了。

于是，我想起了西方近代三位传记作家，德国的路德维希、法国的罗曼·罗兰和莫洛亚。路德维希的崇实精神，使我觉得他更像只重表象的新闻记者；罗曼·罗兰写传记似乎有碍于他的哲理思考的沉重；只有莫洛亚笔下的人物是活灵活现的。

解放后全国第一家只发表新文艺作品的刊物是由茅盾与艾青在北京主编的《人民文学》。距今五十一年前，即1951年端午节，该刊一次性发表了我的《屈原九歌今绎》。对于该刊来说，是破天荒之举。我特别声明我的“绎”不同于“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当时不仅赢得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注意而已。郭沫若先生曾向我道贺，转告我，有一位我敬爱的伟人称赞我为“骚作开新面”（几十年后，胡耀邦同志赠诗，即以此五言起兴）。当1953年，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那时我们尚未进入“联合国”）号召全球举行纪念我国大诗人屈原2230年忌。我所写的另几册屈赋今绎也陆续出版。傅庚生先生开始与我通讯，并在北京与我欢聚畅谈。他的《杜诗散

绎》是对我今绎的呼应。《杜甫诗论》一书则被我纳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之中了。

关于古诗今绎应干系文学赏析，故友王汝弼先生早在1952年就曾写道：

古书今绎，不自今日始，远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已经逐绎过《尚书》，而班固又曾逐绎过《史记》。不过自从汉代以后，经师注疏之学兴，而此风顿邈。因此许多有价值的古书，都渐渐和后人陌生起来，有许多现代人，一提到读古书，就要感到头痛。不是他们对自己伟大祖先的创作不知重视，实在是由于诘倔聱牙的本文，和浩如烟海的说解阻碍着他们。

可是逐绎古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工作不但要通过训诂名物的基本素养，而且假使所逐绎的对象是文学，则从事者还需要有文学的素养。不但辞藻要紧，甚至于音节韵律，也都需要审慎地加以简练揣摩。以上两种还只是形式上的考求问题。至于要使笔调有如原作那种透人的热力，则还需要一种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要以作者的心为心。能以作者的心为心，则床头捉刀人，满可以有英雄气概；不能以作者的心为心，则无论如何装做，也只能如虎贲之似中郎，貌是神非。

怀沙先生的绎文，是兼具以上三者，而后者



是尤为出色的。

我认为王汝弼先生的文章，论点很有见地，即“今绎”也罢，“赏析”或“欣赏”也罢，都要做到“以作者的心为心”，所以汉人的重视训诂继之以宋人讲求义理，是有道理的。

但王汝弼先生的谬誉加诸我身是不对的。所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末尾写道：

若干过当的谬许，不仅使我汗颜，抑且使我惶恐。尤其是从来持重的汝弼先生由于爱护我，更是由于爱护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好些字眼都下得过火了。从客观上看，他恍惚是在向未来的从事绎绎中国古典文学的朋友们，提出完美的希望和要求。纵使我个人“受之有愧”，但我深信即将有人会“却之不恭”的。因此，我愿意以最诚挚的心怀将汝弼先生的宏文保留下转赠给即将以严肃的态度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朋友们，以谢我今日亵渎屈原的罪过。虽然，我也曾竭尽过我所有的努力。

以上文字，我写于1952年8月。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

汝弼先生所期望的，在我认识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家的学者中，我终于找到了一位与古代伟大或优

秀作家心灵相通或心心相印的人。

谓予不信，请仔细研读《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庚生先生在《举隅》中使用的是一种醒豁易懂的古汉语，这较之他驾驭语体白话，更为娴熟，更为得心应手。我建议年轻读者为了学习古汉语，至少应该读：一、《三国演义》；二、金圣叹的《贯华堂文集》；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四、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五、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又，读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似乎更应该一读他的《文学批评通论》。这两部书应是互为表里的。《通论》从理论角度研究文学原理的构成与解析，《举隅》则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应用和实践。

正好比有人说，王国维的《人间词》可以说是《人间词话》的理论的艺术实践，而他的《人间词话》则可以说是《人间词》艺术的理论概括。

庚生先生哲嗣涵章（光）世讲正命作新序。匆匆为之，瞑且倦矣，聊申敬忱而已，岂敢“文字徒劳计拙工”乎？请以不佞近年所为骚音集联礼赞傅公曰：

佩缤纷其繁饰，循绳墨而不颇。

2002年9月24日拂晓

自北美归来不及旬日，

今午又将飞粤。

序

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在近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著作中，是最值得我们细读的一部。他在《书旨与序目》中说：

自有清一代迄于今，世尚朴学。探讨文学者，亦几乎以考据为本。若就文以论文，辄必震惊群目，甚至腾笑众口。本末之所在，久其蒙然，买椟而还珠者，宜不少矣。

这见解是很正确的。因此，我联想到梁宗岱先生在《屈原》自序中所说的文学批评的内线和外线。梁先生所谓外线，便是傅先生所谓朴学的考据；所谓内线，便是傅先生所谓就文以论文。我愿就这一点上略申己见。

中国之有近代式的文学批评，始于王国维先生。王先生以天纵之姿，不但在诗歌的创作上弱冠便有伟大的成就，尤其在古文学的研究上留下了不朽的杰作，如《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等。他所以能有超人的成绩，一方面因为他对于西洋



文学和哲学有湛深的研究，一方面也因为他深懂得分析的（analytique）和综合的（synthétique）方法之运用。例如在他写《宋元戏曲史》以前，他已写了《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脚色考》、《曲调源流表》等六种。这六种便是近于所谓外线的著作，《宋元戏曲史》便是近于所谓内线的著作。正确的说，前六种是分析的工作，后一种是综合的工作。分析（analyse）为综合的准备，综合（synthèse）为分析的目的。不仅文学批评必须兼备两种工作，任何科学的研究莫不皆然，任何成功的学者决不会忽视其中的一方面。

五四运动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故二十年来文史研究都注重于史料的考订，渐渐成为风气。后来变本加厉，竟认史学即史科学，那当然是错误的偏见。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分现代史学为三派：一是传统派或记诵派，二是科学派或考订派，三是革新派或宣传派。他说：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二派之治史，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与当身现实无预。……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

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然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之评价，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结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

他理想中的史学是“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平易之面相”。这话虽略有语病，然大体是正确的。

文学批评也是如此。钱先生所谓第三派近于梁先生所谓内线，第二派近于外线，加传统派而为三。除传统派不足道外，我们理想中的文学批评便是用外线的工夫而达内线的目的。其实钱、梁二先生所用名词都嫌不妥，正确的说，就是用分析的工夫而达综合的目的。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里说：

讲屈原的诗，首先须要考证屈原的诗。现在